

手机定时盒开学季热销

《金陵晚报》 王国俊

自律神器

随着开学季到来,一款被称为手机定时盒的产品网上热销,这款声称可以戒掉手机瘾的“自律神器”受到众多网友和学生家长关注。实际上,类似产品近年来一直不断出现,依靠此类手机定时盒、手机锁等产品真的能够摆脱对手机的依赖吗?

手机定时盒等“自律神器”网上热销

郭女士的孩子在上高中,最近她在朋友介绍下,不停搜索一款“手机定时器”,“听朋友说的,也挺神奇的,手机定时器,把手机放进去,设置好时间,在规定时间内孩子就无法用智能手机。”她觉得手机定时盒很适合有孩子的家庭,“和孩子约定时间,设置好定时盒,也许就可以管住孩子随时玩手机的毛病。”

近日,记者联系上一家号称工厂直发店的手机定时盒商家,客服介绍,手机定时盒最近一直销售不错,临近开学更是火爆,每天都能卖出十几个,“可以为考研族戒除网瘾提供帮助,也可以帮孩子管理好手机。”从网店数据看,已有超过3000名用户购买了这款手机定时盒。

记者浏览网店发现,销量在3000件、5000件以上的店铺为数不少。不只在网购平台,在社交网站上讨论介绍手机定时盒的视频、网帖也比比皆是。在不少商家的宣传海报上,这是一款“自律神器”,能有效戒掉手机依赖症,可以实现“放下手机,让生活有光,未来可期”。

产品五花八门,价格高低不等

“手机定时盒并不是某一产品,而是指某一类产品,主要包括手机定时盒、手机锁、手机隔离盒子等。”据一网店商家介绍,这类产品主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简单粗暴的手机定时盒,它是由一个定时锁和一个手机盒组成,将手机放进去,然后用智能定时锁锁上并定时使用;第二种是手机盒和定时锁组合体,这种产品有显示屏直接显示定时时间;第三种是隔离盒形式,就是可以将手机直接放进去,设置定时。值得注意的是,一旦设定时间,前两种可以临时接听电话,但无法使用手机其他智能功能;第三种既不能接听电话也不能使用其他功能,只是单纯实现人和手机的物理隔离。

由于这两年,越来越多消费者意识到“手机依赖”的负面效应,想

要摆脱手机成瘾状况,因此这类产品越来越受到关注。商家为了满足用户“不玩手机”的需求,也是想尽办法改进这一产品,外形也由全封闭向半封闭靠近,价格也多种多样。从记者浏览的多款手机定时盒来看,价格在四五十元至一百多元不等。不久前,小陈就买了一款89元的手机定时盒,在她看来,这个产品是有用的,“我要准备考研,但又放不下手机。有了这个产品后,我一般设置50分钟,在这个时间段内打不开手机,渐渐也就习惯没有智能手机的现状了。”她觉得,这个产品能让她静下心来,实现和手机的“断舍离”。

“解决手机依赖不能单靠一把锁”

实际生活中,对手机的依赖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现象,研究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成年人每天看手机的时间达到196分钟(3小时16分钟,不包含打电话的时间)。长时间使用智能手机的弊端显而易见,特别明显的就是可能会导致视力受损,也正因为如此,不少用户开始对过度使用智能手机“说不”。

“在心理学层面,手机依赖症的说法由来已久。”南京心理咨询师小鱼表示,老年人的手机沉迷、年轻人的熬夜刷手机、少年人的玩手机近视都属于智能手机带来的影响。他认为,手机定时盒这个产品的作用因人而异,对部分想减少智能手机使用时间并有执行力的人群来说是有辅助作用的;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一旦结束使用定时盒,又可能产生报复性使用智能手机心理,并不一定产生好作用,“解决手机依赖最终不是靠一把手机定时锁就能实现的。”

在一份“手机定时锁有用吗”的网络投票中,13%的网友认为有用可以买,73%的网友则认为鸡肋没必要买。正如网友和专家所言,对个体而言,产生手机依赖的原因长期而复杂,仅依靠“手机定时盒”等物理隔离方式是不容易解决问题的,要想克服手机依赖需要的是正确理性认识智能手机并形成良好的智能手机使用习惯。

不给好处不执行,收了好处乱执行? 堵住执行法官贪腐漏洞

《半月谈》 吴帅帅
刘懿德 郑生竹

公开信息显示,近3年来,法院系统重大违法违纪案件多集中于执行领域,宁夏、内蒙古、福建等多个省份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落马,既显示了纪检监察的工作成效,也说明该领域仍是问题高发区。



非领导岗位也容易出大案

梳理相关案件发现,“有偿执行”“人情执行”、套取执行款是执行人员违纪违法的主要形式,也有执行法官利用执行信息优势,帮助他人倒卖“资产包”,通过“假执行”接受当事人利益。

受访纪检干部表示,执行工作特点决定了非领导岗位也容易出现大案,一线执行员收受大额贿赂、违法获利的案件不在少数。例如,华北某县法院执行员、法官助理高某某在办理执行案件中,违规参与企业经营,通过股权倒卖获利超千万元。他办理的60多起执行案件存在违规终结执行等147个违反工作纪律、不正确履行职责的问题。

有的案件还涉及多人作案,东部某区人民法院5名执行法官,直接或间接帮助被执行人“逃废债”金额近亿元,收受贿赂、违法获利达2500余万元。

多重诱因导致案件屡现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执行权制约机制加强执行监督的意见》,进一步规范执行行为。但近年来部分案例显示,导致执行法官干警违法违纪的内外诱因仍然存在。

东部某市办案检察官表示,执行法官的执行权与财产查封、处置等工作直接相关。有些涉案标的价值高的案件,与地方龙头企业多有牵涉,这使得执行法官干警难免面临来自地方的人情请托、利益输送等情况,这些外部诱惑客观上增加了违纪违法的概率。

近年来,执行法官干警违纪违法案例暴露出一个共同特点,即在重大案件中,违纪违法人员长期在执行领域工作,并由此滋生腐败。

最高法已有明确要求,建立常态化交流轮岗机制,执行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和独立承办案件的执行人员,在同一职位任职满5年的必须交流,其他人员在同一职位工作满10年的必须交流。但受执行工作专业性较强、法院人手不足等客观条件所限,相关要求在落实中面临困难。

部分受访法律人士认为,执行领域各环节仍不够透明,向当事人、法律监督机关公开信息的程度仍有提升空间。上海天璇律师事务所律师许世荣曾在执行局工作,他表示,当前执行领域信息公开度相对较低,执行法官受制约束程度小。

“例如,法律要求7天内对被执行人账户进行筛查,申请人只能询问执行法官,但执行法官有没有做,申请人无从得知。虽然最高法也曾推出智慧执行App,公众可以在线申请公开信息,但普及率较低,许多律师同行都不知道有这个App。”许世荣说。

完善执行权内外监督体系

受访纪检干部建议,在工作中落实最高法关于执行权的制约监督机制,例如改变“一人管案到底”的传统模式,科学分解执行工作,形成权力分解的“物理隔离”。对涉及民生、特殊主体、涉黑涉恶的案件,建议采取事前询问、事中提醒、事后评估等方式,确保执行权全程受监督。

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彭辉表示,部分省区市高院推动的执行领域数字化改革,有助于完善内部监督,建议推动执行全流程数字化留痕,提高监督效率。

受访检察机关办案干部反映,在对执行法官开展法律监督过程中,还存在“案卷难调”“脸难看”等问题。建议持续推动执行案件信息公开,在执行领域重点案件的办理节点,法院应及时向纪检监察、人大、检察等部门推送、共享相关信息,完善外部监督体系,让执行权进一步运行在阳光下。

